

回到 快车道



印度尼西亚首都夜晚熙熙攘攘。

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亚洲各国可能需要对其经济增长战略进行升级。

Indermit S. Gill
和 Homi Kharas

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东亚3个中等收入国家——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受到沉重打击。这次危机还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经济增长难以维继。当时许多人认为，危机暴露出来的体制上的脆弱性——腐败、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将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陷于停滞，就像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发生的情况一样。东亚新兴国家预计未来几年内将停止增长。然而，东亚新兴国家自199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记录令人瞩目：以现行美元价格计算，2005年的GDP为4万亿美元，与1998年相比差不多增长了两倍，年均增长率超过9%。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了挫折，新兴国家在过去40年依然保持着持续增长（见表）。

大约十年后的今天，韩国已成为高收入国家，而其他4个遭受危机的国家也在迅速增长。中国已加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越南可能在2010年加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到时在东亚居民中，将有超过95%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之中。

东亚国家将会继续保持这样高的经济增长吗？事实上，中等收入国家（指那些人均收入介于826—10665美元之间的国家）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富裕国家或贫困国家。1980—2000年期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50%，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则增长150%，并且高收入国家与低

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比率下降了一半。相比较而言，在此期间，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实际收入仅仅增长了不到20%，使其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扩大了大约20个百分点。贫困国家的低工资竞争者占据了传统产业，富裕国家的创新者则占据了那些技术正在迅速升级的新兴产业，中等收入国家则在这一夹缝中寻求生存。

基于以下原因的考量，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对其增长战略升级。因为推动一国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快速增长到10000美元（当前大多数东亚国家面临的挑战），与促使一国人均收入从100美元增长到1000美元（大多数东亚国家在过去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转变）相比，这两种情况下所采取的战略存在着很大差异，并且前者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经济研究表明，两股相反的力量同时在起作用。一方面，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它们对商品需求的范围更为广泛，在这些商品中，许多可以在国内制造。这就产生了一股趋向于生产领域多元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只有那些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的国家才会变得更加富裕，即存在一种趋向于生产领域专业化的力量。哪种力量占居优势是一个经验问题。研究人员发现，向专业化的转变通常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并且对生产经济规模存在极大的依赖（见专栏）。

亚洲政府领导人首先应该做什么，

以使国家能够顺利渡过中等收入这一发展阶段？当今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做些什么，以避免自己遭受拉美中等收入国家那样的命运——这些国家在向富裕国家迈进的过程中遭受了失败？本文将对当今东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做深入探讨。

对规模经济的认识

关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亚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从有关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的最新研究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重新产生了兴趣，因为大家发现各国收入水平与传统经济理论预期的并不一致。该理论预期，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最新技术的应用，将有利于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基本含义是，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回报，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可能从资本丰富的地方向资本缺乏的地方流动，从而给这些地方带来最新最好的产品、工艺和技术。

但是上述情况并没有发生。除少数例外——主要是东亚的强劲表现——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这并不意

如何变得更加富裕

虽然一国经济的发展通常要求不断地学习和调整然而最新研究显示，那些人均收入介于1000—1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必须对其发展战略做出以下几个重大转变。

- 从多元化向专业化的转变。一国在成长初期通常倾向于多元化发展，但是这种趋势在一国人均收入达到5000—8000美元时发生逆转，随后该国转向专业化发展。一国在什么阶段达到这一转折点，主要依赖于国家的大小和出口导向，然而这也意味着政策制订者除了需要对国家整体投资环境予以关注之外，还必须创建部门专业化战略。

- 从投资到创新。随着一国企业逐渐掌握了最新技术，鼓励现有企业投资的监管政策应让监管机构鼓励新企业的进入，而那些产品、技术落后的企业则退出市场。这种转变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否则将由于既得利益而难以实施。

- 从基础教育向更高级教育的转变。随着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依靠专门技能所获取的收入将迅速增加，政策制定者必须制定计划，提供数量充足的大学毕业生，以减轻人们在收入方面日益增加的不平等性。在这种规模经济下，知识外溢非常重要，并且有利于政府为更高级的教育提供补贴。

资料来源：Imbs 和 Wacziarg (2003)，Aghion 和 Howitt (2005)，以及 Romer (1994)。

一致的表现

尽管发生了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东亚经济仍然增长迅速。(人均GDP, 1966—2004年, 百分比)

地区 / 国家	增长率	增长率为以下不同情况时的年数		
		负数	0—2个百分点	高于2个百分点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5.8	2	3	34
中国	7.0	3	3	33
印度尼西亚	4.0	4	3	32
泰国	4.8	3	5	31
菲律宾	1.3	6	21	12
马来西亚	4.0	5	3	3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5	10	15	14
中东和北非 ¹	1.2	8	13	9
南亚	2.6	1	12	26
撒哈拉以南非洲	0.2	14	20	5
OECD	2.5	0	18	2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中央数据库。

¹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75—2004年。

味着市场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大多数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贫困也在减少。然而不仅在国家之间，而且在国家内部，人力和金融资本显然是从稀缺的地方向丰富的地方流动。这也意味着在规模经济的世界中，生产要素倾向于向城市聚集。

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规模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就是所谓的“创意”。与商品和生产要素不同，创意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可以被许多人同时使用——也就是说，他们是“非竞争的”。创意一旦形成，就可以作为新的创意的出发点。然而，提出有用的创意需要付出努力。即使是临时性的，人们还可以通过保密或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阻止他人使用创意来改进产品或生产工艺。正是由于这种“排他性”，知识赋予其创造者一些垄断权力，从而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租金”。

通过将知识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学家能够认识到创意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带来的递增收益，但是他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创意并不是层出不穷。适度竞争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但是过度竞争可能减少企业从每个创意中获得的收益，从而降低其创新的积极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有关国际贸易的解释中，通常认为不完全竞争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将规模经济纳入经济总量模型。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已经将这些理论用于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

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如何能够对中等收入国家有所帮助？为简便起见，我们将研究内容划分为两个方面：私

营企业在利用规模经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政府在确保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起的作用。两者都是维持经济增长必须的。

对规模经济效应的正式确认，拉近了政策制定者与经济理论之间的距离，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大体有以下3点启示：

- 所有类型的经济体之间都可以发生贸易。拥有不同资源禀赋的经济体之间可以发生更多的产业间贸易，而拥有相同资源禀赋的经济体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贸易受益。全球和地区一体化都非常重要。

- 市场可能在创意的产生、应用或者对新创意的吸收等方面投资不足，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讲，政府必须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补贴，以使本国在一些领域获得竞争优势。

- 大城市能够为那些可以带来收益递增的经济活动提供理想的场所。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如何保持城市适宜居住，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有关这方面的政策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有关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影响的认识，对中等收入国家同样有以下3个方面的启示：

- 由于城市在经济增长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将城市化作为推动发展、加强城乡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联系的主要内容。

- 在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国家中，对于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增加，技工工资也随之增长。因此不仅在城市内部，而且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收入不平等也在恶化。虽然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完全的平均主义，但是政策制定者至少应该尝试提供公平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机会。

-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可能存在经济租金，而且如何对其进行分配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如果经济租金被重新投资到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领域，经济增长的基础将得到加强。如果消耗在无效的市民、社会冲突甚至腐败之中，则经济增长将相当缓慢。因此，政府必须采用对私人利益损害最小的方式来征收经济租金，并且采用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的方式去花费这些收益。

以规模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包括了专业化和创新，而这两者又是由一体化推动的。东亚国家在保持其全球贸易、技术和金融联系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加强其地区联系，以便扩大其不断膨胀的经济规模。然而随着地区性生产网络重要性的不断加强以及城市的发展，专业化和创新在国家内部导致的地域和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任其发展，这些差距将随着企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而拖慢经济增长的步伐，并且社会冲突将会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扩大而不断加剧。诚实、透明和有效的政府应该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推动可持续的经济集聚（即城市的发展）和劳动技能方面的投资，从而确保自身从规模经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国际一体化已经取得一定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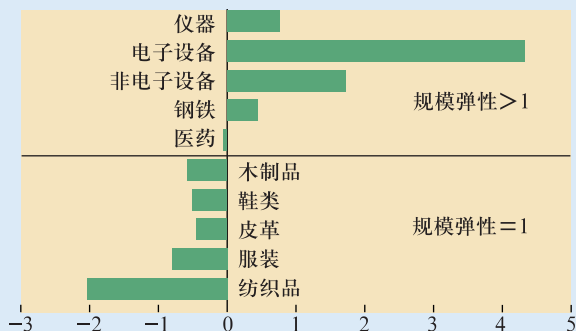
东亚地区很早就融入了全球贸易市场，并且正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不断获得成功。东亚新兴国家（不包括日本）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占到了20%，是其GDP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的两倍，而且其商品贸易总额与其GDP总额相当。以上这些业绩主要归功于新兴国家开放的贸易政策。

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也保持着领先地位，并且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该进程得到了加速。尽管发生了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但在过去10年中，地区性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一半以上的进口来自地区内部，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富有效率的生产网络的产生。这种地区内贸易——对全球贸易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其贸易对象以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进口为主。在地区以外，贸易对象则以最终产品为主。这两类贸易紧密配合：地区内贸易可以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供应链；地区间贸易则可以提供巨大的市场，进而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在能够体现规模经济的领域，东亚地区出口增长最为迅速（见图1）。

大多数贸易发生在城市之间。据估计在东亚，城市贡献了大约3/4的年产出以及1/2—1/3的出口。产出通常集中在单个城市：曼谷占泰国GDP的40%；马尼拉占菲律宾GDP的30%；胡志明市占越南GDP的20%；在中国，上海则占到了11%。

图1
非凡业绩

东亚在最能体现规模经济的领域出口增长最快。
(1994—2004年出口份额的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Antweiler和Trefler(2002)；Gill和Kharas(2007)。
注：规模弹性大于1表示收益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商品或服务的单位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规模弹性等于1表示收益随着规模的变化而保持不变。

……但是国内一体化却落在后面

虽然在全球一体化方面获得了成功,并且地区一体化进程也在不断取得进展,但是许多东亚国家的国内一体化却落在了后面。

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从城市做起,因为绝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城市。受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东亚地区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乡人口转移:在今后20年,平均每月将新增200万城市人口。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给那些超过1000万居民的特大城市带来压力,尤其是提供清洁空气与水、绿地、便利交通以及降低犯罪率等方面的能力。

但是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将在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中发生,根据最新的投资环境调查,这些城市通常管理不善。较差的商业环境导致较少的税收规模,因此这些小城市在重要的社会服务和环境治理方面人均花费较少,进而导致对投资缺乏吸引力。

小型内陆城市与大型沿海城市的收入差距与连接大多数城市和主要港口的国内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虽然东亚地区拥有一些全球最为高效的海港和空运设施,但是国内的物流系统却相当缺乏。

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正给东亚地区的社会和谐带来压力。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教育和基础设施服务的获取等方面的问题,在该地区大部分国家中日益变得严峻(见图2)。农村和贫困地区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地区,而且少数民族并没能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进程之中。超过3/4的国家存在生活水平不平等的问题。

各国政府必须寻求解决国家分配、本地经济管理以及服务的提供等问题的方法。然而一些国家的政府则受到了国内社会团体的严重质疑,因为中央集权导致的腐败已经泛滥成灾。韩国和马来西亚正在积极向香港、日本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看齐,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腐败将受到严厉制裁,并且由于政府建立在法治的

基础之上,因此腐败机会得到了抑制。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也推行了积极的国家反腐计划,并且起诉了一些高级官员。

在当前的问題中,许多是地区层次上的。东亚地区已经在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开支方面进行了中央分权,从长期来看,这可以使地方公共部门的官员在处理政务方面变得更加透明,更有责任心。尽管制度性检查逐渐成熟,但是中央分权可能危害对腐败的控制,损失经济效率,加速社会冲突,扩大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东亚地区一些定性的反腐指数出现了恶化,这表明该地区在反腐败过程中仍然存在差距,上述变化可以对该情况做出一定的解释。这同时表明,各国在面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挑战时,必须很下功夫,以确保政府廉洁公正。

因此,摆在东亚地区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国内一体化,以对其全球和地区一体化进行补充。这就要求必须确保那些与外国有着良好关系而与国内联系仍需加强的城市更加充满活力,增进社会和谐以使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共同进步,建立廉洁公正的政府以便对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进行有效的再投资。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的全球贸易、技术流动以及地区生产网络,可以为该地区各国应对国内一体化的挑战提供充足的资源。如果东亚地区发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像前两个一体化阶段那样,在第三个一体化过程中同样获得成功,他们就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贫困,并且引领自己的国家进入世界富裕发达国家行列。在进行上述努力的过程中,他们也将为全球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有益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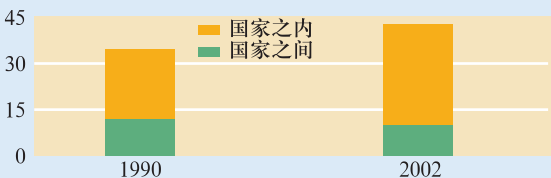
Indermit S. Gill,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办公室经济顾问; Homi Kharas, 布鲁金斯研究院 Wolfensohn 发展中心访问学者,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前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主要参考了作者的著作:《东亚经济复苏:经济增长的创意》(华盛顿:世界银行,2007)。

图2

落后于平等状况

尽管区域经济逐渐趋同,但是东亚的不平等程度仍在上升。
(泰尔不平等指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 Gill和Kharas(2007)。

注: 泰尔指数数值较高表明消费水平的不平等程度较高。

参考文献:

-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2005, "Growth with Quality-Improving Innovation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 1A, 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Amsterdam; Boston: Elsevier, North-Holland), pp. 67-110.
- Antweiler, Werner, and Daniel Trefler, 2002, "Increasing Returns and All That: A View from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March), pp. 93-119.
- Imbs, Jean, and Romain Wacziarg, 2003,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March), pp. 63-86.
- Romer, Paul, 1994,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8 (Winter), pp. 3-22.